

# “China Problem”, “Western Problem” and “Global Problem”

## “le problème de Chine”, “le problème de l’Occident” et “le problème du monde”

### “中國問題”、“西方問題”與“全球問題”

Ma Heming      He Fang

馬和民

何芳

Received 9 September 2005; accepted 28 October 2005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China Problem” and “Western Problem” accompanied by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western capitalism, and the eastward expedition of Christianity, as well as the military aggression of western powers and the oriental movement of western culture. Before the 17<sup>th</sup> century, the manner of questioning among westerners is generally based on the standing of putting China in a high esteem. The tune of “Western-centric theory” started to burgeon. During the 19<sup>th</sup> and 20<sup>th</sup> century, the “questioning” basically followed by a condescending manner and the “Western-centric theory” was initially recognized. After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westerners’ questioning partly turned to embody a stance of equal dialog. From the end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and the early 21<sup>st</sup> century, the “Western Problem” and “Chinese Problem” started to entangle with the “Global Problem”. To trace the history, the conflict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s still exists. Yet the tendency of culture merger is irreversible. The purpose of the merger is to retrospect, criticize and intergrate our own culture and the foreign culture.

**Key Words:** “China Problem”, “Western Problem”, “Global Problem”, merger of culture

**Résumé** L’apparition du “problème de Chine” et “problème de l’Occident” s’accompagne de l’expansion du capitalisme occidental dans le monde entier, le colonialisme, l’expédition à l’est du christianisme, l’envahissement militaire d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et le déplacement de la culture occidentale vers l’Orient. Avant le XVII<sup>e</sup> siècle, les Occidentaux regardaient les choses avec l’admiration pour la Chine et le point de vue considérant l’Occident comme le centre du monde n’a pas encore formé ;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ils se rangeaient dans deux camps, le point de vue de l’Occident central commençait à surgir ; du XIX<sup>e</sup> au début du XX<sup>e</sup> siècle, la plupart d’entre eux suivaient un mode de pensée dominant, le mode cognitif regardant l’Occident comme le centre a ainsi pris forme ; après la Première e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ils se retournaient partiellement dans une position de dialogue sur un pied d’égalité. Depuis la fin du XIX<sup>e</sup> siècle et le début du XX<sup>e</sup> siècle, “le problème de l’Occident”, “le problème de Chine” et “le problème du monde” commençaient à s’enchevêtrer. Passant en revue l’histoire, on constate que les conflits entre 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 et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existent toujours, mais leur intégration a déjà devenu une tendance irrésistible. Ce qui compte, c’est de faire un examen rétrospectif et procéder à l’autocritique sur notre propre civilisation d’une part, et d’autre part apprendre à s’inspirer de la civilisation occidentale et l’intégrer dans la nôtre.

**Mots-clés:** le problème de Chine, le problème de l’Occident, le problème du monde, l’intégration culturelle

**摘要** “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的出現，是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擴張、殖民主義化、基督教的東征史以及西方列強的軍事入侵與西方文化東移後形成的。在 17 世紀之前西方人的設問方式大致是站在

仰視中國的立場上進行的，尚未形成“西方中心論”的格調；18世紀的設問，逐漸形成了兩派相左的觀點，“西方中心論”開始出現苗頭；19至20世紀初則大多沿著居高臨下的思維模式，也即形成了“西方中心論”的認知模式；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人的設問又轉而部分顯現出平等對話的立場。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來，“西方問題”、“中國問題”開始與“全球問題”相互糾纏。縱觀歷史，西方與中國文明之間的衝突依然存在，但是文明之間的融合趨勢業已勢不可擋，其旨在於對自身文明及其他文明的反思、檢討、借鑒與整合。

**關鍵詞：**“中國問題”；“西方問題”；“全球問題”；文化融合

“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的出現，<sup>1</sup>是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擴張、殖民主義化、基督教的東征史以及西方列強的軍事入侵與西方文化東移後形成的。16世紀至19世紀，中國人與西方人各自的“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並不相似。20世紀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儘管各自的“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仍在諸多方面不盡一致，卻產生了疊加與共通的“全球問題”。從而引發出我們對這種“全球問題”是什麼、為什麼與怎麼樣的全新問題意識、思考與探究。

## 1. 17世紀西方人的“中國問題”

“中國問題”，這本身是“西方文化中心論”式的設問，也是一個複雜的文化比較命題。通過對歷史事實的部分描述，將有助於說明在社會、經濟與文化（或文明）比較的範疇內西方人“中國問題”的流變。西方人的“中國問題”自16世紀產生以來幾經變遷，這種變遷無疑將會引致我們作更深入的思考與分析。

在17世紀之前西方人的設問方式大致是站在仰視中國的立場上進行的，尚未形成“西方中心論”的格調；18世紀的設問，逐漸形成了兩派相左的觀點，“西方中心論”開始出現苗頭；19至20世紀初則大多沿著居高臨下的思維模式，也即形成了“西方中心論”的認知模式；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人的設問又轉而部分顯現出平等對話的立場。20世紀末21世紀初以來，“西方問題”、“中國問題”開始與“全球問題”相互糾纏。

### 1.1 17世紀之前西方人的設問

<sup>1</sup> 這裏使用的“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兩詞，不是一個純粹的國際政治概念，而主要是在人文-社會-教育學術範疇內使用的“學術概念”。

15至16世紀之間，隨著地理大發現，西方（主要是歐洲）航海貿易勢力紛紛向東方擴展，最早來到亞洲的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蘭人，然後是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和義大利人等。17世紀之前的西方人對中國的設問可以歸納為兩個基本問題：如何取得東方的財富？如何在中國宣傳基督教教義，從而實現基督教的全球化擴展？

西方人在提出了這兩大“中國問題”後，立即著手解決。關於第一個問題的解決，西方殖民者首先是採取航海貿易，繼而運用武力征服。例如：葡萄牙人阿爾發萊斯為首的所謂官方旅行團，1513年乘中國商船達到廣東珠江口外的伶仃島；西班牙人佔領雞籠（1626），佔領淡水（1629）；荷蘭人先後兩次佔領澎湖（1604、1622）；再佔領臺灣（1624），這些事件均是荷蘭人多次向明朝要求貿易特權未果的情形下出現的；英法等國則是自17世紀初開始進入中國。

隨著歐洲航海貿易、殖民勢力的東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向東方迅速擴展。基督教文化究竟何時傳入中國，長期以來眾說紛紜。<sup>2</sup>基本的結論是：明清之際，實際上是以基督教為核心的西方文化迅猛向外擴展的時期。來自西方不同國家、不同教派的傳教士，搭乘各國的商船到亞洲各國進行傳教活動。我們從16-19世紀西方諸國在中國的著名傳教士概況大致可以瞭解。

例如：最早來東方者義大利人沙勿略（Francis Xavier），首先到達印度，再到日本和中國廣東的上川島（1552）；義大利耶穌會士利馬竇（Matteo Ricci），於1581-1610年間在中國，

<sup>2</sup> 基督教是西元135年從猶太教中分裂出來成爲一個獨立的宗教。中國歷史上一般根據明朝天啓年間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後，認定基督教文化自唐朝開始傳入中國。1517年，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形成了“新教”，在我國俗稱“基督教”，這也就是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本文所指的基督教的傳教主要是指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以後的活動。

是明朝時期聲望最高、影響最大者；葡萄牙耶穌會士陽瑪諾 (Manoel Diaz) 1610 到達中國；義大利耶穌會士龍華民 (Nicolas Longobardi)，1597 到達中國，接任利馬竇為中國傳教團監督；德國湯若望 1622 到達中國，是明末清初在華傳教士中聲名最盛、影響最大者，並在清廷中任大官。法國傳教士金尼閣 1622 與湯若望一起來華。但是，基督教始終受到傳統中國的抵制，最著名者是康乾年間的百年禁教。直到鴉片戰爭，帝國主義列強依靠炮艦打開中國大門，傳教權被列入不平等條約，才出現了新的傳教活動。

在世界宗教史上，以一個宗教流派，卻由不同國家的傳教士共同經營傳教活動，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宗教、文化與政治現象。但必須指出的是，西方基督教的傳播實質上是與更為廣泛的非宗教活動密不可分的，即宗教、文化、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活動的廣泛聯合與融為一體。

所以，17 世紀西方人對上述兩大中國問題的解決方案是：貿易、傳教與侵略擴張的三位一體。早在 1452 年教皇尼古拉斯第五就宣佈：“葡萄牙王的征服就是教會的征服”（林仁川等，第 34 頁）。如此，才會有各種各樣的武力傳教計畫。例如，西班牙傳教士桑徹斯在 1582 年到達福州和廣州，認為勸化中國的唯一辦法就是借重武力（林仁川等，第 76 頁）。然而，由於當時明朝的國力比較強大，又大多採取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西方諸國的“求東方財富”與“傳教”的兩大問題並未得到徹底解決。16 世紀 70 年代，一個西班牙軍官在寫給西班牙國王的信中說到：“中國人是高度文明的，他們擁有我們所有的一切武器，他們的大炮品質優異，比我們鑄的還要好。——如果國王願意對這個地方進行偵察——我就會確定，貿易和征服應該怎樣進行才好。”<sup>3</sup> 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 19 世紀前期。

## 1.2 17 世紀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認識

總體而論，17 世紀的西方對古老中國的瞭解主要是通過兩大途徑：第一是傳教士、商人、旅行家以及入侵官兵的書信、見聞與口頭交流而獲得部分認識。第二是通過翻譯至西語的中國古代

典籍而形成對中國文化的部分認識。其中，自然離不開馬可波羅遊記的影響。在 17 世紀，中國的古代典籍已經在那裏刊行。例如：1662 年，法國翻譯出版發行了《大學：中國的智慧》；1663 年，法國翻譯出版發行了《中庸：中國政治道德學》等。這些書籍又被翻譯成英文、西文、德文、俄文等。1687 年傳教士柏應理以拉丁文翻譯出版題為《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曾激起西方思想家的重大反響；根據何兆林先生的研究，此期有關中國最重要的書籍是 1669-1695 年間荷蘭出版的八卷本《耶穌會士的實踐倫理》，高比晏 (Le Gobien) 編撰的《中國近事》(1703)<sup>4</sup>；而法國的巴黎大學是 17-18 世紀歐洲的“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南懷瑾，1977）。

西方人正是在 16 世紀開始所提出並試圖解決的兩大“中國問題”的過程中，逐漸獲得了對中國的某種認識。而這種認識基本上是站在既陌生又熱切、既有野心與貪念又有無奈與敬仰的矛盾心情基礎上的。對此，我們還可以從另一些西方歷史名人的著述中找到佐證。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極為重要的人物之一，在中國生活 28 年之久的義大利傳教士利馬竇，儘管負載著傳教的“神聖使命”，但他基本上是以敬仰的語氣而設問的。比如，“我仔細研究了中國長達四千多年的歷史，我不得不承認我從未見到有這類征服（如同他的西方國家一樣——作者加注）的記載，也沒聽說過他們擴張國界。”<sup>5</sup> 更令他倍感驚疑的是，中國“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更加令外國人驚異的是，在事關對皇上和國家忠誠時，這些哲學家一聽到召喚，其品格崇高與不顧危險和視死如歸，甚至要超過那些負有保衛祖國專職的人”。（利馬竇，60 頁）利馬竇自然也注意到此期的中國人對西方人的態度：“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看做沒有知識的野蠻人”（利馬竇，94 頁）；“因為他們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利馬竇，181 頁）。他也注意到了另外一個事實：中國有學問的人幾乎都是鑽研儒教與道德哲學的，結果是幾乎沒有人獻身於研究

<sup>4</sup> 何兆林. 中西文化交流史論.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1 年, 第 162 頁.

<sup>5</sup> 見利馬竇回憶錄. 基督教遠征中國史, 中譯為《利馬竇中國劄記》. 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 第 59 頁.

<sup>3</sup> 轉引自林仁川, 徐曉望.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衝突.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第 43 頁.

數學或醫學（利馬竇，34頁）。

我們還能在17世紀英國政府的高官，也是著名的哲學家費蘭西斯·培根（1561-1626）那裏，發現此期的英國人對於那個古老的遠東中國的敬仰與讚美。培根在其著名的《新工具》（1620）一書中指出：印刷、火藥和磁石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都改變了。<sup>6</sup> 培根無疑是把中國四大發明的功績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地的重要西方人物。

德國近代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自20歲起始終在研究中國哲學，他在《致德雷蒙的信：論中國哲學》一文中表達了對中國的認識：“中國是一個大國，它在版圖上不次於文明的歐洲，並且在人數上和國家的治理上遠勝於文明的歐洲。”（萊布尼茨，何兆武主編，第133頁。）

由上可見，17世紀西方人對“中國問題”的設問方式，儘管是站在殖民的立場，但他們對當時中國的總體認知是出於驚疑、尊重和敬仰的基礎上的。

## 2. 18世紀西方人兩種對立的觀點

18世紀的西方伴隨著殖民主義的加劇，資本主義在世界範圍的擴張，以及武力征服在非洲、美洲、東南亞等地的暢行無阻，逐漸形成了傲視世界的思維與認識方式。於是，一方面17世紀的兩大西方古典式的“中國問題”仍然盤桓在西方人的腦際，另一方面“西方中心論”式的“中國問題”逐漸產生。但是，此期的西方文化界仍然有不少敬仰中國古老文明的西方人，他們不同于那些崇尚武力征服世界的西方人，從而在西方世界形成了針鋒相對的“美化”與“醜化”中國的兩派。

### 2.1 18世紀“西方中心論式”的“中國問題”開始萌芽

<sup>6</sup> 培根的原話是：“-----在古人所不知、較近才發現、而起源卻曖昧不明的三種發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藥和磁石。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力量和影響都仿佛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見《新工具》，商務印書館1984年，第1卷，第84頁。

這種局面最明顯的反映在同時代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1689-1755）與經濟學家魁奈（1694-1774）、孟德斯鳩與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1694-1778）之間。孟德斯鳩在他的最負盛名的代表作《論法的精神》（1748）<sup>7</sup>一書中，反對法國傳教士美化中國（這實際上正是17世紀西方人對同時代中國的普遍認識）的傾向，認為“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孟德斯鳩，129頁）並認為中國人是地球上最會騙人、貪得無厭和缺乏道德的民族（孟德斯鳩，316頁）。孟德斯鳩的認識中國自然有他特定的認知背景與思維方式，這裏我不予以討論。

18世紀英國哲學家休謨的“中國問題”，既有工業革命及歷次歐洲陸海戰之後英國式的“傲慢與偏見”，又有“歐洲利益之上”的“西方中心論”色彩。他的第一個設問與20世紀的英國人李約瑟的問題完全一致：“中國的科學進步為何如此緩慢？”而同時他又向西方人提出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為什麼歐洲的白銀往中國流動？”（休謨，何兆武主編，第9頁）。這樣一個設問，仍然是17世紀西方人的設問。同時代的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則從經濟學層面分析了“中國和印度金銀價值高於歐洲的原因”，同時他又分析了中國人輕視製造業與對外貿易的問題，並據此斷言中國經濟落後的原因。<sup>8</sup>

18世紀德國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儘管承認“歷史開始於中國和蒙古人——神權專制政體的地方”，但他也認為“中國和印度還在世界歷史的局外，而只是預期著、等待著若干因素的結合，然後才能夠得到活潑生動的進步。”<sup>9</sup>（黑格爾，160頁）。顯然，這是一種比較客觀與公正的認識，但我們無疑也能從中發現“西方中心論”的印痕。

### 2.2 18世紀遺存的“美化中國派”

與孟德斯鳩同時代的法國經濟學家魁奈，則在《中國的專制主義》（1767）<sup>10</sup>一書中，對孟德

<sup>7</sup> 孟德斯鳩著、張雁深譯。《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87年。

<sup>8</sup> 詳見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等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83年。

<sup>9</sup> 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三聯書店，1956年，第157、160頁。

<sup>10</sup> 何兆武等主編。《中國印象：世界名人論中國文化（上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斯鳩提出質疑，認為中國的政治是合法的專制政治，皇帝是合法的皇帝，中國是“一個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人道、最繁榮的國家”（魁奈，何兆武主編，59頁）。伏爾泰則在他的《風俗論》（1756）和《哲學辭典》（1764）中對中國文化給以極高評價：“在4000年前，在我們甚至還不能閱讀時，中國人已經知道了我們現在用以炫耀的全部極其有用的東西了”（伏爾泰，何兆武主編，65頁）。儘管伏爾泰也指出了中國在科學方面沒有取得如西方那樣的進展，但中國使道德至善至美，而這是科學首要的東西。（同上，69頁）。

### 2.3 18世紀東西方的基本平等狀態

中國自明末清初的大動亂後，整個18世紀屬於康、雍、乾盛世階段，國力強盛；而同期的歐洲正處於爭奪霸權與解決國內階級矛盾危機的階段（如英法為爭奪殖民市場和海上霸權的幾次大戰，尤其是著名的“七年戰爭”（1756-1763）、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的獨立戰爭等），無暇他顧。因此，西方人對中國的殖民大致處於停滯狀態，武力傳教也就因此作罷，17世紀的經典問題未獲解決。“西方中心論”式的“中國問題”儘管業已萌芽，但東西方基本還處於平等對話狀態。我們從18世紀基督教在清朝政府的幾起幾落中可以找到證據。

例如：順治親政年代（1645-1661），湯若望採取編撰“西洋新法”，親近順治帝，推進了天主教的大發展，涉及15省，發展11萬多教徒。康熙三年（1664），楊光先上奏反“西洋新法”，著《辟邪論》，形成以修曆為導火線的教案，湯若望、南懷仁等被捕入獄；康熙八年至40年（1669-1701），楊光先與南懷仁關於曆法之爭，並以南懷仁的新曆精確而勝利。南懷仁向康熙爭取到為湯若望平反。南懷仁作成一批天文儀器（康熙13年），康熙21年，作成神威炮，康熙31年，解除禁教令，至40年（1701）。雍正時期（1722-1735），全面禁教。乾隆時期（1735-1795），乾隆于1746再次向全國發佈禁止不尊重祖先的天主教，1746年，處決進入福建的傳教士白多祿等人。

17-18世紀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其發展的成因是與傳教士的傳教策略的變更密切相關的：第一，利馬竇採取尊重中國文化傳統的漸進方法而得益，而繼任利馬竇的龍華民因否定而遭遇

“南京教案”；第二，湯若望、南懷仁等採取不涉及意識形態的引入科技發明、繪畫活動的漸進法而取得一定發展；第三，清朝前期，教皇與清朝皇帝的“禮儀之爭”（林順川等，第194頁）不斷發生，從而遭遇百年禁教。<sup>11</sup>

概言之，18世紀西方式的“中國問題”並無多少實質性的推進。但是，伴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化進程的逐步實現，尤其是近現代的西方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在18世紀的漸趨成型（其重要標誌是美國的獨立），“西方中心論”式的“中國問題”逐漸產生，所涉及的範圍已經包含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道德、習俗等幾乎一切領域。在此我們還必須指出，儘管18世紀是“中國趣味”（diechinoiserie）風行歐洲的時候，中國的繪畫、園林、建築、漆器、瓷器等工藝在歐洲宮廷和貴族中大受歡迎（何兆武，165頁），但是西方人對中國的認識也無多少新氣象。以18世紀德國大哲學家康得為例，他在18世紀90年代開始對中國表現出很大興趣，但他對中國的論述幾乎是建立在傳記、道聽塗說和主觀臆測的基礎上的，因而充滿了不符合事實的許多闡述。<sup>12</sup>

### 3. 19世紀的西方中心論

19世紀的西方中心論，是與大不列顛殖民英國世界霸主地位的確立，歐洲的資產階級革命，歐洲大陸資產階級民族國家的形成，尤其是工業革命首先在英國，繼而在歐美其他許多國家的發展壯大密不可分的。東西方世界史上一般認定歐洲大陸的工業革命開始於1800年前後（王斯德，123頁）。

英國為進行世界性的殖民掠奪和海外貿易，自15世紀末至19世紀初發動了上百次對外戰爭。16世紀在排除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海上霸權

<sup>11</sup> 如羅馬教皇克來孟11世於1704年、1715年、1719年分別派使節與康熙帝的交涉基督教的禁約，但均遭到康熙帝的否決。1725年，羅馬教皇本篤13世派特使向雍正進貢方物，希望改善關係也遭遇婉拒。乾隆即位後同樣實行禁教。1742年，羅馬教皇本篤發佈“自上主聖意”通諭，重審嚴禁中國教徒祭祖、祭孔的指令，使得教皇與中國皇帝矛盾進一步激化，終於導致1746年，福建省處死傳教士的流血事件。

<sup>12</sup> 詳見（德）夏瑞春編、許雅萍譯。《德國思想家論中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

後，又與荷蘭發動三次戰爭，將其擠出爭霸圈。18世紀英國人在世界範圍內的對手是法國，在美洲、印度和海上，英國均以最終勝利者傲居，直至1763年簽定《巴黎和約》，英國獲得了西屬美洲、法屬北美、印度等，還確立了海上霸權，從而確立起世界範圍的“日不落殖民帝國”，直至20世紀以後被美國趕超。

1640-1689年，英國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確立起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政治制度。在18世紀至19世紀中葉的將近100年時間裏，英國基本完成了從手工生產向機器生產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過渡。至此，19世紀中葉的資本主義英國基於各種複雜的歷史因素，率先跨入工業文明的門檻。

與此同時，法、德、意、俄也在為重新爭奪歐洲大陸的霸權進行著不斷的爭鬥。第一帝國在拿破崙的帶領下，擊潰反法同盟，在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之前，法國始終掌握著歐洲大陸的霸權。

19世紀當歐洲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時候，德意志尚未完成統一的民族國家。反對拿破崙的戰爭催生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識，並在1848年主要由德意志資產階級領導發動了一場規模空前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運動。1862年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麥為普魯士政府首相，他堅持“小德意志”方案（即把奧地利排除在外），從而將民族統一、君主政體、容克專制巧妙地結合起來（王斯德，第147頁）。並在與義大利結盟後發動“普奧戰爭”（1866），最終於1871年成立了統一的德意志帝國。

同德意志的歷史有驚人的相似處，義大利也是在法國大革命、反對拿破崙、以及“普奧戰爭”中，於1871年第一次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美國在經歷了第一次獨立戰爭之後，又經歷了1812年的英美戰爭（又稱第二次獨立戰爭）、南北戰爭之後，工業資本主義取得了徹底的勝利。工業化的深入和擴展造就了一個強大而“同質”的民族國家。正如法國歷史學家蜜雪兒·博得所說：“在美國，只是在南北戰爭之後，資產階級才找到它興起的道路”（博得，第120頁）《資本主義史：1500-1980》。在19世紀的最後30年，美國迅速崛起，成為西方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

整個19世紀，西方在發展資本主義的過程中，爭權奪利、勾心鬥角，經歷了大大小小數百

次戰爭，終於基本確立起現代西方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資本主義開始在全球範圍內以“西方文明”這一近現代話語的方式迅猛擴展。然而，“資本”的本質是“貪婪”，它汲取利潤的渴望是無止境的。這便決定了資本主義擴張、征服的本能。因而19世紀的中西方關係實質上就是征服與被征服、掠奪與被掠奪的關係，西方人17世紀以來的經典“中國問題”也就窄化為一個問題：如何獲得東方的財富？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所遭受的巨大災難最典型地印證了這個命題。

如果說在19世紀的西方人中，還有哪些新式的“中國問題”具有研究價值的話，那也就是源自19世紀20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命題：“為何資本主義發生於近代西歐而非封建發達的東方中國？”儘管韋伯式的設問曾經引發了大量的後續研究，並且至今仍在繼續，但是必須記住：這一韋伯式的設問本身就是“西方中心論”的話語。這從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一文的“作者導論”中反映無疑：“生為現代歐洲文明之子，研究任何世界性的歷史問題，都必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的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於怎樣一些環境呢？”（韋伯，第11頁）。

雖然還有同時代法國大作家雨果（1802-1885）對西方文明的批評：“兩個強盜闖進了圓明園，一個強盜大肆掠劫，另一個強盜縱火焚燒”，表達了對英法侵略者的強盜行經的痛斥和對中國人的同情，但並無助於改變19世紀的西方人“中國問題”的主流話語系統。

#### 4. “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的相互纏結

當19世紀的西方列強協力擴展殖民地、開拓海外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之時，中國被迫進入了資本主義世界一體化的進程，開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150年鬥爭歷史。19世紀中葉以來的中國人第一次遭遇到了自身的“中國問題”，而中國人在探究“中國問題”解決之道的過程中，又遭遇了20世紀初西方人的“西方問題”。於是，世界

歷史便在這裏重疊：“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就在世界歷史宏觀發展的邏輯進程中相互纏結起來了。中國人是在被動應對近現代化的歷史境域中引發與直面“中國問題”的，其歷史的要求是“變革傳統，發展現代性”；西方人則是在發展近現代化的歷史境域中遭遇“西方問題”的，其歷史的要求是：反思現代性與西方文明。於是，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一語境中，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交織成了“全球問題”。

#### 4.1 中國人的“中國問題”

中國人在 19 世紀中葉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後，惘然應對“亡國滅種”的巨變，第一次遭遇到了自身的“中國問題”，這一問題自然與西方式的“中國問題”全然不同。自 19 世紀中葉以來迄今，無論是清末、民國、國內戰爭、抗戰，還是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人的“中國問題”幾乎始終如一，這就是：強國富民，迅速走上現代化道路，也就是步入世界現代史的進程。

#### 4.2 中國人的“西方問題”

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順著歷史的進程，可以發現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存在三類：第一類認識是在 19 世紀中葉以前，視“西方人即蠻夷”；第二類是在遭遇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後，許多中國人堅定不移地急於要求“西化”；第三類大致是在 20 世紀初開始了對“西方文明的懷疑論”。中國人的“西方問題”由此突顯。我們將會發現，中國人的“西方問題”是與西方人的“西方問題”存在著極其相似的背景特徵的。

在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前，中國人並不存在“西方問題”。這一問題的形成源於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與利益爭奪，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羅素在“中西文明的對比”一文中，也說到了他所遇到的幾個中國人“在 1914 年之前不怎麼懷疑，但‘大戰’讓他們覺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羅素，1922，第 153 頁）。

#### 4.3 20 世紀的“中國問題”

20 世紀的西方在東西方問題中，另一個曾經引起過巨大反響的西方式“中國問題”的設問是李約瑟的問題：“為何近代科學發生於西方而非

中國或亞洲其他任何地方？”國內關於所謂“18 世紀學”的研究，可以為此佐證：“為什麼在西方發生工業革命的同時，中國作為農業文明時代的一個非常有創造力與影響力的地區，卻沒有能發生工業革命？”無疑，這樣一個 20 世紀的“中國問題”更多的不是“西方中心論”式的發問，而帶有全球性思考的框架。

#### 4.4 全球問題的產生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東方的一幕悲劇，但也同時裁判了西方歐洲的命運（南懷謹，19 頁）。西方文明的神話消解了，“西方中心論”對全世界的設問方式開始發生局部的轉型。20 世紀的西方人在遭遇了西方文明自身的浩劫與毀滅後，開始了整體性的無奈的自我反思，並在某種徬徨的心態下逐步採取平等的立場對世界各種文明進行相互比較。所謂“全球問題”也便因此而起，與此同時西方人的“中國問題”開始與自身的“西方問題”聯結起來予以思索。

到了 20 世紀初，西方第一位拋棄“歐洲中心論”的著名學者英國作家威爾斯，在他久負盛名的著作《世界史綱》（1920）中的設問是：“中國文明在漢唐超過西方，只是到近代才為西方超過”。差不多同一時期，德國人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沒落》（1918）出版。

1925 年當選為法蘭西院院士的著名詩人瓦萊裏（1871-1945）在為他的中國朋友盛成《我的母親》一書法文版所作的序言，是很能反映 20 世紀初西方人的帶有反思性的“中國問題”的：“歐洲人發問：他們（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之後怎麼沒有延伸這一才幹，繼續努力一直到有磁性科學呢？而有了指南針之後，他們怎麼沒有想到率領艦隊到遠洋去認識並征服大洋彼岸呢？中國人還發明了火藥，但沒有進而研究化學，進而造出大炮，而是把火藥濫用於煙火和晚間無聊的娛樂之中。”（何兆武主編，第 85 頁）。

20 世紀法國文學泰斗之一羅曼·羅蘭的思想，更清晰地表達了西方人開始站在平等對話的立場的自我反思：“我不知道什麼叫歐洲，什麼叫亞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兩種族類：一種是向上的靈魂的族類，另一種是墮落的靈魂的族類”。<sup>13</sup> 羅曼·羅蘭還說出了部分先進西方人的自

<sup>13</sup> 這是羅曼·羅蘭於 1925 年 1 月所寫的《約翰·克利斯朵

我反思：“中國人對我們不放心，這一點我理解，這是有道理的。若干世紀以來，中國為了認識歐洲的以及在他們本能地製造與販賣的理想主義的尺寸，付出了代價。”<sup>14</sup>

20世紀聲譽卓著的英國哲學家羅素充滿疑惑的痛苦是：“西方文明的希望日顯蒼白”。他在1922年寫就的《中國問題》一書中表達了這種困惑：“從人類整體利益來看，歐美人頤指氣使的狂妄自信比起中國人的慢性子會產生更大的負面效果。‘大戰’（一次大戰）的爆發表明我們的文明中有那麼一些瑕疵，而俄國和中國的情況則使我相信這兩個國家能使我們分清對錯”。因為“歐洲人的人生觀推崇競爭、開發、永無平靜、永不知足以及破壞。導向破壞的效率最終只能帶來毀滅，而我們的文明正在走向這一結局。”因此，唯一的希望就是“借鑒一向被我們輕視的東方智慧”，否則，我們的文明就沒有希望了（羅素，1922）。

總體而論，20世紀西方人的“中國問題”在遭遇二戰重創後而與西方人的“西方問題”相互纏繞，被引入到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全球問題”之中。儘管，由於新中國成立後基於多種原因的自我封閉，而致20世紀的西方人對中國的瞭解也不算很多，例如，1955年訪問中國的薩特夫人波伏娃說：“對我而言，中國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家”（波伏娃，何兆武主編，第125頁。）。但是，畢竟世界正在走向相互理解、整合、對話與交流的進程中。

## 5. 結 論

從上述對中西方各自的“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的梳理，我們將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 自15、16世紀以來的東西方問題，在經歷了各種形態的文明碰撞（諸如傳教與抵制、入侵與反抗、通商與閉關鎖國、殖民與反殖民）之後，儘管文明之間的衝突依然存在，但是文明之間的融合趨勢業已勢不可擋。

2. 中國自19世紀中葉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來，西方諸國自1914年遭遇“大戰”以來，各自文明的優越感盡失。從而開始了對自身文明及其他文明的反思、檢討、借鑒與整合。

3. 尤其是20世紀迄今，“中國問題”與“西方問題”開始被置於“全球問題”或“世界問題”背景之中予以討論。這種以自我檢討與反思為典型特徵的對“全球問題”的討論與分析，對於轉型期中國如何採取正確的自我定位、對於世界文明的一體化進程，以及現代與後現代的合理對話，均將具有重大意義。

### 作者簡介：

①Ma Hemin（馬和民），男，1964年4月，教育學博士，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大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華東師大教育科學院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教育信息技術系系主任。

②He Fang（何芳），女，1983年1月，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系2004級碩士研究生。

### 通信地址：

①馬和民，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200062

②何芳，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200062

夫致中國兄弟們的公開信》的文字，最先發表於1926年1月10日的上海《小說月報》。

<sup>14</sup> 羅大岡. 論羅曼·羅蘭.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79年, 第417頁.